

文史资料选辑

合订本

第42卷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文史资料选辑

合订本

第 42 卷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一百二十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部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我的戎马生涯 李 觉(1)

求学时代——从军初期——十年歧途——八年抗
战——起义前后

两广事变

蒋介石企图利用我倒陈济棠的一幕 林 虎(23)

何键在两广事变中玩弄两面手法 罗子受(28)

人物述林

追忆先父宋哲元将军 宋景昭(35)

忆旧谈往

创办汤池训练班的前前后后 杨显东(50)

张学良三次派我去陕北红区 周相臣(63)

民盟史料

四川民盟策动川康军政人员起义概述 张松涛(66)

经济史料

雪泥杂记

——我的创业生涯 章剑慧(90)

无锡老家——初出茅庐——荣氏兄弟——迁厂奇

迹——创办了各项企业——西北建厂——接收日

本纺织厂——彷徨和抉择

回忆《中国实业志》编纂经过 冯和法(106)

艺术史谭

永不反悔的路 张 权(110)

童年的歌——启蒙者——流亡学生——留学生涯

——黄金岁月——噩梦——难忘哈尔滨十七年

——也许是多余的话

齐派艺术的传人——娄师白 邹士方 秦宝春(131)

“抓周”时他抓了毛笔——听“封箱戏”——巧遇名

师——正式拜门——言传身教师徒情——改名

——“老师健在，我决不出名卖画”——创新——

足迹遍及海内外——《齐白石绘画艺术》出版

旧案重提

关于光绪之死 察存者(145)

狱中奇遇

——与金树仁谈金树仁案 濮清泉(151)

漠北纪游 封鹤君(170)

补充·订正·质疑

我亲身经历的“三·一八”惨案实况

——订正楚溪春《“三·一八”惨案亲历记》中的

几处谬误..... 杨春洲(179)

我的戎马生涯

李 觉

李觉，湖南长沙人。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，后投唐生智，曾参加北伐战争。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对日作战，屡立战功。历任国民党高级将领。1949 年与程潜、陈明仁等于湖南起义。新中国建立后，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，全国政协第二、三、四届委员，第五、六届政协常委。

我姓李名觉，号云波，在家时又名淑志。湖南长沙人。祖父母去世早，无叔伯。父亲因家境艰难，读书不成，改为经商，流寓云南一带。我母亲是云南景谷县人，共生一女三男，我是最小的一个。我生于 1900 年旧历五月初十。当时，正值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景谷县接近英属缅甸，父亲为安全起见，护送我们母子回到家乡长沙。在城里购置一所房子，在乡下买得水田 15 亩。安置妥贴后，第二年父亲又去云南继续经商，不久即病死在昆明。当时，我只两岁，最大的是姐姐，也只 9 岁。母子们无依无靠，幸亏家有薄产维持。母亲勤劳节俭，生活严肃，具有极端吃苦耐劳的倔强性格，又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妇女。母亲这些可贵的品质深深影响了我，使我从小养成老实诚恳，不畏艰难的好品德。母亲为了教子成名，光宗耀祖，千方百计让我们兄弟读书。两个哥哥学工科，而我则经历了曲折的求学道路。

求学时代

1906年,我入县立初小读书。当时已经废除了科举,创立了新学,学堂不收学费,但还是要拜孔夫子。

我10岁那年,进入县立高等小学,每年仍要参加祀孔和祭天的典礼。这些旧的教育,使我更加习惯于循规蹈矩,守礼奉法。第二年,辛亥革命爆发,我才11岁,谈不上受到多少革命影响,但社会动荡使学业荒废了。至1912年高小毕业时,我有好几门功课不及格。母亲非常着急,节衣缩食,为我聘请良师在家补习了一年,两位学工科的哥哥也利用假日为我补习功课。

1913年我终于考取了长沙修业中学,一读又是3年。由于小学基础没有打好,中学课程又十分繁重,我对读书越来越不感兴趣了。正好这时北京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招生,我请邻居的一位军官帮忙,竟然考上了这个学校。

1916年,我第一次离开母亲到千里之遥的北京入学。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和兴奋。学习不到半年,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,京城大乱,无法上课。停学半年,局势平稳后,重新入学。两年后,爆发了五四运动,同学们纷纷卷入其中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我当然也不例外。北洋军阀政府不许学生“闹事”,派了一连士兵来“保护”学校,不准外出集会,不准看报会客,接电话都有限制……这样变相地把师生们关了一个多月后,又决定提前放假,各自回家,到下半年才复学。这次爱国运动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,第一次懂得了“爱国光荣,卖国可耻”,懂得了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道理。

1919年底,我在这所军校毕业,被分配到山东省境边防军第二师当入伍生。这是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一支新军,全是日本装备,并有日本军事教官负责上课。但我们这批经过了“五四”洗礼的入伍生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主精神,因此常常与日

本教官的霸道行为发生龃龉，激起纠纷。连我这老实人也常常受到他们的责罚，使我很不安心在此服役。半年后，发生了直皖战争，段祺瑞战败倒台，这支新军也就解散了。于是，我和十几位湘籍同学决定回湖南，回到革命气氛较浓的南方家乡去参加革命队伍，免得受外国人和北方人的窝囊气。

从 军 初 期

1920年11月，湖南已由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担任省督军兼总司令。他倡导与四川等省搞联省自治，并对湘军实行整编。我回到长沙后，即和同学们去找当时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团长唐生智，说：“唐团长，我们已找到一份工作，每月津贴大洋10元，请您帮忙作个转荐。”唐生智听后，半天没做声，最后才说：“良相出自州牧，猛将来自行伍。想带兵的人，要先到士兵当中去磨炼，不要只顾浮在上面多赚钱。”于是，将我们分到一个营去当排长。

这个营是新从嘉禾收编过来的土匪部队，士兵毫无纪律可言，生活作风也非常腐败，是当时唐团中唯一的一支烂部队；全靠营长周至柔（湖南郴州人，保定二期毕业）和几个从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排长在里面撑持着，骨干力量显然不够。唐生智将我们分配进去，是抱着很大期望的。但我们当时都只十八九岁的青年。“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”，士兵们认为我们这些当官长的人没有胡子，是不足以震慑部队的威风煞气的。因此，讲话无人听，做事无人帮，使我感到非常苦恼。唐生智总是宽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说：“你们把老姜烧熟了去烫嘴唇，可以烫出胡子来的。不信，你们试试看。”同学都知道这是句玩笑话，但我信以为真，老老实实地去试了一试。结果，当然什么也没有烫出来。幸亏几个老排长是云南籍人，我也算有半个云南籍，同事加同乡，自然好相处。我当时牢记唐生智要我们去士兵中磨炼的训话，不怕吃苦，不摆架子，经常和老排长们一起与士兵们玩游戏，作劳役。那些土匪出身的士兵，虽然言语粗

俗，动作野蛮，但都很识好歹，很讲义气，因此很快就信服了我们，还亲切地叫我“小排长”。行军打仗时处处照顾我、保护我。

1921年夏，湖北发生宣武兵变。鄂省国民党党员李书城、蒋作宾等与鄂军师长夏斗寅密谋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，怂恿赵恒惕联合四川刘湘共组“援鄂军”，约定事成之后设三省联省自治政府于长沙。6月，赵恒惕调齐各路湘军北进至岳州羊楼司，王占元宣布下野^①。但驻节洛阳的吴佩孚却荐肖耀南为鄂督，并派四艘兵舰，由水路进攻岳州，大败赵军。当时，唐生智已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，率兵冲在最前面，我也随在其中。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的战斗，心中未免有些畏怯。但看到唐生智总是以身作则，进攻在前，退却在后，深受感染，也自动请求和唐生智一同断后。唐问我：“怕不怕？”我说：“旅长不怕，我怕什么？”唐生智点头赞许，此后对我十分器重。这年10月，即派我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去深造；但读了三个月后，直奉又发生战争，学校又解散，我又回到唐旅长第三团第八连当连长。一个月之后，局势平稳，我才又去保定带薪复学。

1922年5月，我在保定军校毕业，回原部队继续担任连长。该团团长是刘兴，他具有极端严谨、一丝不苟的军人特性，平日腰杆挺直，一点不弯；对内务整理绝不马虎；打起仗来也和唐生智一样，身先士卒，非常勇猛。这一切，都对我产生极好的影响。

这时，何键在唐部担任骑兵团团长。他原先也只是谭延闿部下一名排长，吴佩孚南进占领省城后，赵恒惕派他回醴陵老家打游击。他由一支九响枪起家，和张国威一起，从北洋军手中夺枪扩军，到1919年已发展成拥有一千多人枪的队伍。时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招他为旅长，后因程潜下台，而被唐生智收编为骑兵团营长。此后，他随唐生智作战，屡有战功，得升团长、旅长。他有五个女儿，大女儿何玫秀外慧中，颇有见地，立志要嫁一个老实忠厚的

^① 据《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》记载，王占元于1921年8月免职。

年青军官。于是由唐生智作伐，我和何玫订立了婚约。1923年夏我和何玫在长沙结婚。婚后不久，谭赵战争又起。这年7月，谭延闿在广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为号召，组织“讨贼军”，赵恒惕则以维护联省自治的省宪为名，组织“护宪军”。两军相峙，赵恒惕一面派叶开鑫抵御湘南谭军，一面派唐生智、贺耀组对湘西蔡钜猷军发起攻击。开始时，赵部一师师长宋鹤庚、二师师长鲁涤平以及旅长吴俭学、谢国光等均纷纷附谭倒赵，声势浩大，赵督岌岌可危。幸唐生智挺身而出，在打败蔡钜猷后，又与叶开鑫、贺耀组等一起奋力作战，将谭军及宋、鲁、吴、谢等部一古脑儿赶出了湘南，赶到了广东。这时我还在刘兴部下，不恋新婚燕尔，奋勇当先，立下了战功，被擢升为第二旅第十四团二营营长。

1924年，唐生智被赵恒惕任命为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，驻衡阳。唐实力不断壮大，所部扩充到四个旅，十五个团，达五万人枪；以刘兴、李品仙、何键和周斓分任第二、八、九旅及警备旅旅长，成为湘军中最具有战斗力的队伍。这一年，我被调到第九旅第二十七团三营当营长，从此归属到何键部下。同年秋天，赵调第四师到广西支援陆荣廷打内战。唐生智对此不感兴趣，只派了我等少数几个营的兵力，到全州附近的黄沙河，将被李宗仁等打败了的陆荣廷接到永州，即算完成使命，不再深入桂境。

1925年，第四师的官兵在唐生智亲自倡导下，全部加入了佛教，实行“五戒”（即戒偷盗、戒妄语、戒乱杀、戒邪淫、戒酗酒），我也虔诚地参加了这一斋戒行列。当时我们这些营以上的军官，绝大多数都由衷相信唐生智、顾伯叙先生所倡导的“自利利人，救人救世，猛勇精进，慈悲喜舍”等宏愿及大无畏精神，相信这是修养军人身心最好的教义。加之，顾先生精通佛学密宗，尤会瑜伽气功，能够飞身腾跃，更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当时这些很科学的特异气功，被一般无知的人说成是邪术，唐、顾等人因不愿泄露密宗真义，也不肯多加解释，只是潜心修正道，如实知自心。其实，顾先生专心致志于此，对唐生智的具体军政事务并不过问，只是帮唐分析

大局,顺应时势,这对唐生智及我们第四师后来终于进一步倾向革命,参加北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。

1926年初,唐生智在湘南掀起讨吴驱赵运动。3月,赵通电辞职,唐生智到长沙就任代省长。4月,吴佩孚援赵,率军南下,我们在唐生智指挥下奋起抗击,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。6月,唐生智在衡阳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,所属第二、八、九旅及警备旅改为第四、五、六师及教导师,官佐皆上升一级,我也由营长晋升为团长。

7月,我随同第八军全体官兵一道,集体宣誓参加中国国民党。湖南是先有共产党,后有国民党的,国民党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有名的共产党人,如夏曦、郭亮、李维汉、易礼容等。他们都是相信唯物主义的,我们这些军人对三民主义、共产主义都不甚了解。我去问唐生智:“怎么去年入佛,今年又入党?”他说:“佛化党化二位一体,唯心唯物是两极相通的。”我又问:“何以见得?”他说:“国民党讲三民主义,主张‘天下为公’,大同世界;共产党讲‘人类解放我解放’;我们佛教也说‘众生解脱我解脱’,这不都是一致的么?”当时,说得我十分信服。

8月,我随何键师从长沙出发,过岳州后一路疾进。在一次战役中,我带着全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,冲过城陵矶狭长的新堤,长驱冲入汉阳附近。这时,何键等已策动汉阳守将刘佐龙参加了北伐军,从而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汉阳城和汉阳兵工厂,获得了大量的军械。后来,利用这军械物资,仅第八军就扩大装备了五个军。

9、10月,汉口、武昌相继被我军攻克,我又随唐生智、何键进军鄂西宜章、沙市,肃清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残余势力,并向巴东、秭归方向戒备。

1927年2月,袁祖铭暗中勾结吴佩孚阴谋偷袭长沙,截断北伐后路。周斓奉唐生智密令,在旧历年关摆下鸿门宴,智歼袁祖铭于常德城。此时,我也接到密令,进驻澧州,相机策应,尽歼了袁军残部,解除了北伐军后顾之忧。此役,袁祖铭的警卫团长许克祥倒

戈投诚，被编入何键部下。

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，何键亦蠢蠢欲动。一日深夜，在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的司令部里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，决定会后第三天拂晓，将留在武昌的第四军全部解决，并扣押俄国顾问鲍罗廷。当时议定：汉口由李品仙的武汉卫戍司令部负责；武昌由何键负责。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，负责阅马厂地区；当即看好了地形，作了部署。会后，周斓打电话密报唐生智，因此正待按期行动时，唐生智从河南前线拍急电回汉，命令停止执行，并限所有部队于次日集中大智门江岸一带，开往河南驻马店待命，继续北伐到底。

上述几件事情，使我十分佩服唐生智矢志北伐，统一中华的爱国之心；佩服他那除奸务尽，不搞内讧的鲜明爱憎。此时，我虽然已颇具战斗经验，成为能独当一面的第三十五军第三师第八团的团长了，但是，讲老实话，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的，以致终于在后来迷失了方向。

十年歧途

1927年5月，长沙发生了“马日事变”。反动派“反共驱唐”的阴谋得逞，迫使唐生智“分共”，终于停止北伐。7月，我随军从河南驻马店调回武汉，在汉口广济、武穴一带集中。8月，唐生智坚持东征讨蒋，我又随军开赴九江集中，随即由黄梅、宿松、桐城进入安庆、合肥一带，迫使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。

这年11月，李宗仁、谭延闿、程潜又联合起来西征讨唐。我奉命随军撤退。唐生智要求我们在一星期之内，日夜兼程退回湖北忻春。但这时芜湖和安庆已失守，退路已受到威胁，乃绕过崇山峻岭，到忻春集中。由于山路难行，部队疲惫不堪而节节败退。回到武汉的当晚，即听说唐生智已下野，并已东渡日本。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，也非常难过。从此，我像失魂似地不知如何是好。

1928年3月,唐生智所部五个军在退到湖南后发生了分化。除三十六军军长刘兴和十七军军长周斓随唐生智一同引退外;第八军李品仙和十三军叶琪投靠了桂系;三十五军何键则为程潜所收容,最后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。我是何键的女婿,自然也只能随何附蒋,还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和器重。但在我的内心深处,却一直忘不了唐生智对我的提携培育之情,也忘不了第一个顶头上司刘兴,忘不了良师契友周斓。唐母、周母和我母平日情同姊妹,亲如一家,因而我对唐、刘、周三位就更加眷念。

1928年5月,取唐生智、周斓而代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,突然被桂系军阀诱至武汉扣押起来,鲁涤平继任省主席。当时,困守湘西的何键与鲁关系不好,蒋介石乃乘机派刘文岛与何键秘密联络,意图去鲁用何。与此同时,桂系为与蒋介石争夺势力范围,亦图争取何键,乃于1929年2月,挟武汉政治分会之权,派李明瑞师偷袭长沙,驱走鲁涤平,迎何键为省主席。何键处于两者之间,左右为难;正在彷徨之际,蒋介石却为稳定局势,顺水推舟,于这年4月正式委定何键就任。何键喜出望外,欣然应命,自此,即在蒋、桂及其他各大派系的夹缝中图存发展,在湖南当了九年之久的省主席。我也以何门长婿、何部主将的身份,走上了歧途。

1929年夏,桂系见何为蒋用,又欲以叶琪取代何键,并从汉口派兵逼近长沙市郊。城内人心惶惶,纷纷逃避。这时,我毫无畏怯,一面维持城内治安,担任最后掩护,将部队安全转移到湘西;一面与蒋介石联络,夹攻进犯之桂军,终于取胜。于是,我部又回到长沙,我也因功被任命为长沙警备司令。四个月后,长沙城内发生特大抢案,在各方面压力下,何键只好将我撤职,叫我仍去做团长,调赴新宁、城步、武岗一带攻剿张云卿。在新宁期间,我做了一件好事:当地国民党县党部为邀功请赏,诬陷该县两个中学校长为“共党”,报请省清乡司令部严惩。我奉命查办。经查证,纯系陷害,乃不予受理。

1929年秋,蒋介石对盘踞武汉的桂系军队实行讨伐,李宗仁

在汉口立足不住，派人见何键，要求通过长、衡退回广西，被何键婉言谢绝；只得由宜昌、沙市经澧州、桃源、淑浦、新宁进入广西。蒋介石密令我部就近堵击，我则认为：政局变化无常，今日是敌，明日是友；今日打垮桂系，明日则要吃掉我军；湘桂终属邻省，唇亡齿寒。于是，我命令所部让开大路，只占领侧面阵地，假意佯攻阻击，实际上等于放鞭炮欢送他们撤回广西。其他各路湘军也效法我，只瞞住了蒋介石一人。后来，湘军整编，四个军改为四个师，军长改当师长，而我却由团长晋升为第十九师第五十七旅旅长。

1930年初，唐生智在河南接管桂系军队后，第二次兴兵反蒋，密邀何键响应，蒋介石亦派刘文岛来笼络何键。我当时极力主张弃蒋就唐，何键却只佯许之，回电唐曰：“如打到武汉，当响应。”另一方面，又向蒋表示“服从中央”。后，唐生智失败，何键安然无恙。我则挨了何键一顿臭骂，说：“要是依你附唐，则同归于尽，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

1930年秋，长沙被红军攻占。这时，我旅正驻扎在广西全州和兴安一带，奉命回师驰援；红军主动退至浏阳后，杀了一个回马枪，向长沙进攻，并在文家市附近歼灭了何军一个旅；我等只好退回长沙城内，固守了一个多月才解围。随即追击红军至江西萍乡。这时，驻在江西的鲁涤平、谭道源等则利用何键的这次挫折，大肆攻讦，欲取何而代之，他们还联络闲居在南京方面的湖南人士叶开鑫、贺贵严等共同反何，指责他搞封建割据，只重用醴陵人，搞“非醴勿用”。何键吓得不亦乐乎，派我到南京疏通各方。蒋介石此时想利用这些矛盾，以湘制湘，因而仍支持何键任湖南主席，并重新整饬湘军部队，撤换了反对何键的三个师长，任命我接任第十九师师长之职，极力维护何派势力。

1930年冬，澧州被湘西红军贺龙部攻占，我奉命前往增援，并指挥陈渠珍师，罗启疆旅等部收复澧州，迫使贺龙红军退往鄂西。蒋介石乃倾全力“围剿”江西红军，任何键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兼西路军总司令，意欲尽驱湘军入赣，为其效力卖命。这时，我向何键

建议,还是要保存本部实力,否则只会落得个“兔死狗烹,鸟尽弓藏”的下场。于是,何键乃留我的十九师为总预备队,滞驻省内,分散在岳阳、蒲圻、衡阳、常德一带,始终不肯入赣“剿共”。两年后,我兼任师党部特派员;移驻平江、浏阳等地,专做后方安抚工作。当时湘鄂边区疫病流行,双方均无战斗。我在后方,接触许多“自新”的共产党,亲身了解到他们之所以屡战不溃的奥秘。于是,也学过他们一些方法,如不准杀人,优待俘虏,保障“自新”人员生命财产等,使安抚工作颇具成效,受到蒋介石的表扬,命我专司此职。这也使我在1931至1933年期间,避免了去江西与红军主力作战,逃避了被歼灭、被击溃的危险。

1933年,湘军大部调往江西后省境空虚、政局不稳,而要新编军队蒋介石又绝不会同意,于是我协助何键将各县地方团队利用起来,以县为单位进行整编,进行集中训练。积少成多,一时竟达到四个师,二十四团的兵力。经费由全省统一征收附加税解决,军事方面由省保安处统一指挥。我兼任了保安处处长。这无形中增加了何键维持湘局的力量。

1934年11月,湘鄂川黔的红二方面军开始突围,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四省边防区“剿匪”总司令。陈诚规定何键所部负责担任以澧州、石门、慈利、大庸、永顺、桑植、保靖、龙山之线的防守,并规定:如果红军从谁的正面地区突破,则该地区的指挥官有失职之责,将严加惩办。其目的是把带兵官撤职,将部队兼并过去,据为己有。此时我正由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一月归来。刚结业即率军进发湘西。我的十九师的防地又是最长、最容易被突破的。怎么办?于是我请何键将王东原的第十五师摆在常德一带,靠近陈诚的总部;因王东原与陈诚是保定第八期同班同学,私交甚厚,过从甚密,因而情报较灵,能及时掌握红军动态,能帮助我们湘军各部避实就虚。这时,陈诚自己的部队却被红军在大庸、桑植境内消灭了一旅,并在慈利溪口附近,被红军突破了封锁线。而我十九师等何系部队战线长而守备无虞,受到总部嘉奖。于是,我又擢升为第

四路纵队司令，统率第十六、十九、六十三等师继续尾追红军，一直追到云南、昆明，均无差错。在此之前，何键曾被蒋介石撤销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军职，由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升代。此时，却因我的被擢升而使何键又取得了对这支军队的大部分指挥权。

1935年冬，我的纵队到达昆明后，蒋介石即命令留驻不动，藉以代表中央军控制云南，以达到用杂牌制杂牌的目的。这当然是我们湘军很不情愿的事，我乃以请假省亲为名，回湘请示何键如何处置。时两广酝酿反蒋，与云南也取得了联系。李宗仁、白崇禧派唐希忭来长沙联络何键一同参加，以期共同在西南另创局面；最低限度也希望湖南不要妨碍他们的行动。何键正感军队远处边陲，受人所制，亦思有所活动，乃征询我的意见。我说：“老蒋该反。但唐生智都反不倒他，两广又有何能耐？要他们搞出一定规模，我们才好表示态度。”何键深以为然，乃派我以回防云南为幌子，顺道去桂林一探虚实。于是，我于回长沙后第三日，即乘自备汽车前往广西。李、白派人迎至黄沙河；我又乘专机经柳州到南宁，向白崇禧转交了何键的亲笔信。李、白决定派李品仙、唐希忭陪我再次同机返湘，与何键再作进一步商谈。而何键乃一面派我与之周旋；一面通过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向蒋介石告密。不久，两广事变终于被蒋介石解决，我周旋于两者之间的事也被老蒋发觉。一天，蒋命顾祝同转知我到广州去，我十分惊慌，不知所措。幸亏何键在蒋介石左右极力疏通，终于逢凶化吉；不但未加斥责，而且说我迷敌有功；并在广州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。尤感意外的是：还获准将部队调出云南。不过，不是回归湘省，而是开赴江浙。从此，湘军正式脱离了何键的节制，而由刘建绪直接指挥，军队的命运则全由蒋介石来亲自主宰了。

八年抗战

1936年10月，我部奉调从云南到达浙江嘉兴、建德、桐庐